

1938年長沙大火事件的調查與檢討

楊維真

摘要

1938年10月25日武漢撤守後，湖南長沙成為日軍下一個主攻目標。11月12日，湖南省主席張治中誤判日軍逼近長沙，情急之下，決定實施焦土政策，乃於當日深夜開始在城內外放火。結果長沙幾乎付之一炬，並造成民眾生命財產巨大損失，是為「長沙大火」事件。事件發生後，外界反應頗為激烈，湘人對此更為憤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親赴長沙處理善後，開始調查事件起因及責任歸屬問題。當時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副局長戴笠適在長沙，親自經歷此一事件，曾迭電報告離開長沙時所目睹的動亂情形，以及湖南省保安處與長沙警備司令部12日晚在城廂內外放火之事實。戴笠對張治中在事件前後的作為多所質疑，認為其能力不足以應付危局；而人亦在長沙的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也認為張治中必須為慘案負起最大責任。結果張治中被革職，長沙警備司令酆悌、警備第二團團長徐崑、湖南省會警察局長文重孚被判處死刑，為大火事件負起最重的責任。受此事件衝擊，各方開始檢討焦土政策，並建議縮小破壞範圍，僅限於軍事目標，這也算是此不幸事件對後世較正面的影響。

關鍵字：蔣中正、戴笠、張治中、焦土政策、長沙大火

Revisiting the Case of the 1938 Changsha Blaze Incident

Wei-chen Yang^{*}

Abstract

During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Chang Chih-chung, the governor of Hunan Province, misunderstood the next target of victorious Japanese Army would be his capital Changsha when China's army retreated from Wuhan, the capital of Hupei. He made a fatal mistake to hurry to execute an unbelievable scorched earth policy, resulting in the city being almost burned down to the ground. This has become remembered as the so-called the Changsha Blaze Incident of 1938.

Many people severely and strongly criticize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s command for such an outrageous incident, so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went to Changsha immediately, and asked to investigate into the causes of the Incident and the reasons for carrying out the decision in addition to the demand that the punishment of the culprits. The deputy chief of the Bureau Investigation Statistics (BIS) Dai Li gave an eyewitness account to the Generalissimo. He reported that the governor was the very person who executed the scorched earth policy without full considerations.

The important leaders of the Changsha garrison headquarters were sentenced to death, while the governor Chang under the Generalissimo's protection was just having his official title removed. This means, the BIS was not responsible for the incident. Besides,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made a correction about the scorched earth policy by limiting to destroy the military targets owing to the lesson of Changsha Blaze Incident.

Keywords: Chiang Kai-shek, Dai Li, Chang Chih-chung, the scorched earth policy, the Changsha blaze incident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 Institute of History,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1938年長沙大火事件的調查與檢討*

楊維真**

壹、前言

1938年10月21日廣州失守，中國軍隊乃於是月25日主動撤離武漢後，武漢會戰告一段落，中日戰爭進入第二階段。此際，日軍在戰略上雖不再作速戰速決的打算，但卻試圖打通粵漢鐵路，以切斷中國東南沿海與西南大後方的聯絡。為此，日軍下一個主攻的目標就是湖南省會長沙。¹ 長沙控扼長江、湘江、洞庭湖水運，自古以來在軍事上即甚為重要。而當粵漢、浙贛、湘桂黔鐵路在抗戰前夕相繼通車後，長沙更成為貫通中國東南及西南交通的重鎮，實為第二期抗戰的戰略重點。緣此，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在離開武漢後就駐節湖南南嶽，指揮戰守事宜，並於同年11月初親赴長沙坐鎮，直至是月11日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來長，始離長沙赴粵視察。加以原先負責武漢防衛的第九戰區長官部於武漢撤守後，將其前進指揮部遷設長沙，司令長官陳誠亦進駐此處；因此，第二期抗戰進行之初，中日雙方即以長沙攻防戰為重心。² 同年11月初，日軍分兵進迫湘北，11月9日臨湘失陷，中國軍隊退守岳陽、汨羅、平江、益陽一帶，日機

* 本文初稿曾於2011年10月8日，在國史館舉辦的「戴笠先生與抗戰時期情報作戰」學術討論會中宣讀，承與會諸先進指正，謹申謝忱。另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惠賜寶貴意見，已針對內文進行修改，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12年3月12日；通過刊登日期：2012年4月23日。

**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¹ 陳誠口述，趙虛吾整理，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臺北：國史館，民國93年12月，初版1刷），頁112。

² 陳誠口述，趙虛吾整理，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112-113。

則屢屢轟炸長沙等地，情勢日趨緊張，湖南省府乃開始對各廳處職員及長沙民眾進行疏散（省府各機關遷至湘西沅陵）。11月11日，日軍又攻占長沙門戶岳陽，岳陽距長沙僅150公里，它的陷落更使長沙陷入一片恐慌和混亂之中。

11月12日，湖南省主席張治中因誤判日軍行將逼近省城長沙，在情急之下，決定按原先計畫實施「焦土抗戰」，以堅壁清野，乃於當日深夜開始「有計畫、有組織」地在城內外放火。³ 結果日軍未至，長沙城已先焚，並造成無辜民眾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失，是為「長沙大火」事件。⁴ 事件發生後，外界反應頗為激烈，甚至譏諷守軍「不抗戰而焦土」，而湘人則對此更為憤慨。因此，蔣中正乃於11月16日親赴長沙處理善後，開始調查事件起因及責任歸屬問題，並下令組織高等軍法會審，嚴懲肇事人員。20日，軍法會審訊結，長沙警備司令鄧悌、警備第二團團長徐崑、湖南省會警察局長文重孚三人被判處死刑，為大火事件負起最重的責任；至於湖南省主席張治中則革職留任，責成善後。⁵ 然而，長沙民眾街談巷議頗不以此種處置為然，咸認為張治中應負最大責任，以致公開張貼文字詆斥張治中者隨處可見。其中最為傳頌一時的，是一幅嵌入張治中姓名的對聯：「治績云何？兩大政策一把火；中心安忍！三顆人頭萬古冤。」橫額則云：「張皇失措」。⁶

長沙大火事件，不僅對於抗戰的軍心士氣打擊甚大，同時也導致長沙全城90%以上的建築物被焚燬，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與俄國史達林格勒、日本廣島、長崎同為被戰爭破壞最嚴重的城市之一。關於此一抗戰初期的重要事件，過去論著如朱沛蓮〈長沙大火別記〉⁷ 及張振國〈長沙大火真相〉⁸ 等文，多為親身經歷者的事後回憶。至於學界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當推何智霖〈長沙大火

3 事後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駐長沙）在電呈蔣中正時，即稱此事件為「有計畫、有組織之暴行」，見「電呈委員長蔣以長沙大火請予處分」（1938年11月17日），《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108-00022-237。

4 因長沙大火事件發生於文日（12日）晚上，故此事件又稱「文夕事件」。

5 陳誠口述，趙虛吾整理，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114。

6 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冊（臺北：綜合月刊社，民國62年5月，初版），頁467。另見陳誠口述，趙虛吾整理，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115。

7 朱沛蓮，〈長沙大火別記〉，《中外雜誌》，第18卷第1期（民國64年7月），頁53-54。

8 張振國，〈長沙大火真相〉，《中外雜誌》，第18卷第6期（民國64年12月），頁14-18。

相關史料試析》一文。⁹ 何氏該文雖對長沙大火相關史料（多為回憶性史料）及事變經過做了整理分析，但因為成文較早，一些重要史料未及使用。尤其罕為人知的是，長沙大火事件發生時，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以下簡稱「軍統局」）副局長戴笠適在當地，親自經歷此一事件；待其率部撤退至湘西沅陵後，曾迭電報告離開長沙時所目睹的動亂現象，以及11月12日晚湖南省保安處與長沙警備司令部在城廂內外放火情形。事實上，長沙大火後戴笠一度被懷疑涉入其中，日後國防部情報局（前身即為「軍統局」）出版的戴笠傳記，即稱「張治中火焚長沙，湘人憤怒難平，蔣委員長親赴長沙查處此事，張治中竟將全部責任推卸到戴先生身上，誣稱係戴先生下令長沙警備司令鄧悌、警察局長文重孚、保安第五團長徐崑縱火的。蔣委員長不相信，……急電戴先生趕回長沙，對質此事。戴先生乃將事先勸阻無效，曾將實情上報之事稟明；再經蔣委員長查證屬實，才免去一場誣陷之災」。¹⁰ 由於戴笠的報告具有即時性及權威性價值，實為探索長沙大火之珍貴史料。有鑑於此，本文將利用新近整理出版的《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彙編：軍情戰報》以及國史館典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等相關檔案資料，探討長沙大火事件的起因、善後及檢討。

貳、事件背景：「焦土抗戰」政策的實施

近代以來，中國因國疲民弱，屢遭列強侵逼，如何抗擊外敵，一直是有識之士深思苦慮的焦點。20世紀初，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刊印西方兵學大師克勞塞維茨（Karl Von Clausewitz）的名著《戰爭論》（德文：Vom Kriege, 英文：On War）日文譯本，不公開發行，但中國留學生都設法覓得此一日譯本來閱讀，深感獲益良多。¹¹ 1915年，《戰爭論》中文譯本在中國出版，對中國軍政學界的影響更大。

9 何智霖，〈長沙大火相關史料試析〉，《國史館館刊》，復刊第5期（民國77年12月），頁131-142。

10 費雲文編纂，〈戴雨農先生傳〉，收入國防部情報局編，《戴雨農先生全集》，上冊（臺北：國防部情報局，民國68年10月，初版），頁93-94。

11 吳相湘，〈中國對日總體戰略及若干重要會戰〉，收入薛光前編著，《八年對日抗戰中之國民政府（1937年至1945年）》（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67年9月，初版），頁57。蔣中正自述獲得此書後，曾用紅筆圈點用心讀過幾遍，是最喜愛的讀物之一。

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一書中，屢屢以1812年拿破崙征俄戰役為例，說明攻略疆土廣大的國家至為困難，甚至若干會戰失敗、一部分國土乃至首都淪陷，都未必就能減少被侵略國家獲得最後勝利的確實性，克勞塞維茨的說法給中國軍人帶來極大的振奮。中國如同俄國一般，也是一個廣土眾民的國家，師法俄國先例抵抗強國入侵顯然可行。1917年，由護國名將蔡鍔輯錄的《曾胡治兵語錄》一書刊印，在該書結語中，蔡鍔亦根據1812年拿破崙攻俄失敗及南非波耳戰爭（Anglo-Boer War）¹² 等戰史經驗，鄭重指出：「鄙意我國數年之內，若與他邦以兵戎相見，與其為孤注一擲之舉，不如採用波亞戰術（按：即波耳戰爭），據險以守，節節為防，以全軍而老敵師為主。俟其深入無繼，乃一舉殲除之。昔俄人之蹙拿破崙於境外，使之一蹶不振，可借鑒也。」¹³ 近代史家吳相湘認為，這就是「以空間換取時間」對日戰略最早的公開發表。¹⁴ 此後，蔣百里、傅斯年、胡適、丁文江等有識之士，相繼倡議運用中國廣土眾民的條件長期抗日，終於醞釀形成吳相湘所稱「向國內退軍」一後退決戰的抗日戰略。後退決戰本屬持久消耗戰，1812年俄國抗擊拿破崙入侵，即澈底執行堅壁清野，並將莫斯科焚燬，不留任何物資以資敵。因此，中國當局有鑑於此，亦計畫若對日戰爭一旦爆發，將實行「焦土抗戰」政策。

就相關檔案資料來看，有關「焦土抗戰」一詞在抗戰前早已出現。如1933年5月26日，華覺明在致電湖北綏靖主任何成濬時，即提出「力主焦土抵抗」。¹⁵ 1936年4月，廣西第四集團軍總司令李宗仁在廣州對報紙記者發表談話，也力主焦土抗戰，表示為了抗日救國，「必須發動整個民族解放戰爭，本寧願全國化焦土，亦不屈服之決心，用大刀闊斧來答覆侵略者，表現中華民族自存

¹² 波耳戰爭是英國為了爭奪南非殖民地，與南非荷蘭裔殖民者波耳人所建立的南非共和國所爆發的戰爭。波耳戰爭共有兩次（1880-1881、1899-1902），在波耳戰爭中，波耳人發揮全民戰爭的精神，採取全民動員、平時與戰時結合、兵民結合的策略，搭配誘敵深入、節節抵抗及游擊戰法，給予來犯的優勢英軍嚴重的打擊。

¹³ 蔡鍔，〈《曾胡治兵語錄》序及其按語〉，收入曾業英編，《蔡松坡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第1版），頁1251。

¹⁴ 吳相湘，〈中國對日總體戰略及若干重要會戰〉，頁56。

¹⁵ 「華覺民電何成濬張繼方覺慧等力主焦土抵抗但彼等已早去新鄉畏清議」（1933年5月26日），〈文件·電報·各方往來電文原案及錄存·各方民國22年5月往來電文錄存（三）〉，《閩錫山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16-010108-0245-050。

自立之偉大能力與精神」。¹⁶ 而同年11月7日，廣東綏靖主任余漢謀在電呈蔣中正時，亦稱：

此次對日交涉，至勞睿念，漢謀迂愚，竊以為交涉雖極困難，終當秉承鈞座決策，謀整個解決，不宜就局部妥協，致中狡計。且驗諸歷年事實，我退則彼進，我前則彼却，此次周旋壇坫，似宜於不喪權、不辱國之原則下，堅持到底。否則祇有焦土抗戰，作最後之犧牲。職部分防，行將就緒，現正準備國防，誓當竭誠擁護。¹⁷

當日李宗仁、余漢謀等人所謂「焦土抗戰」，即代表對日本決心作最後、最慘烈的犧牲，實施持久消耗戰，以換取抗戰的最後勝利。

及至1937年7月抗戰爆發後，「焦土抗戰」一詞頗為盛行。1938年4月，李宗仁將歷年有關焦土抗戰之論著，集結出版《焦土抗戰的理論與實踐》一書後，「焦土抗戰」更蔚為風潮，甚至隱然成為國府抗敵的重要決策。1938年10月20日，軍事委員會軍令部部長徐永昌即在其日記中寫道：

在保定時，政訓主任徐君主焦土政策，以為萬一撤退時，擬將所有人民攜之後方。余詢人民要不走我們如何逼使走？路上如何相率？如何給養？到地如何生活？則又決無善法。在南京時，熊天翼亦主張焦土移民云云，是主此者當不止於徐、熊矣。¹⁸

事實上，當1937年7月中日開戰後，國府在淞滬戰役及南京保衛戰尚不及實施焦土抗戰；但到了1938年下半年武漢保衛戰期間，「焦土抗戰」已成為中國進行持久消耗戰的政策。是年10月13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一處主任賀耀組、

¹⁶ 當時華南報紙以〈我的主張焦土抗戰〉為題，將李宗仁談話正式發表，後來此文收入1938年4月出版的《焦土抗戰的理論與實踐》一書中。參見李宗仁，〈我的主張焦土抗戰〉，收入氏著，《焦土抗戰的理論與實踐——李宗仁言論集》（出版地不詳：全面戰周刊社編印，民國27年4月，初版），頁1。

¹⁷ 「余漢謀電蔣中正對日交涉宜秉不喪權辱國原則作焦土抗戰準備文電日報表」（1936年11月7日），〈程表彙集（五十一）〉，特交檔案——一般資料，《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478-054。

¹⁸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0年12月，初版），第4冊，頁407。熊式輝字天翼，時任江西省政府主席。

軍統局副局長戴笠聯名電呈蔣中正，匯報由於江西九江失陷前未能貫徹焦土作戰政策，以致日軍獲大量物資情形。電文曰：

九江自淪陷後，暴敵除姦淫燒殺外，並將有歷史性及珍貴之物品悉數搬運回國。近將各商店居戶中搜出之日用品及我軍遺棄之大米萬餘包，分發漢奸與難民以示小惠，或賤價售於苦工以收人心。現市民頗感敵軍之來反獲利益，甯肯冒險亦不遠離。查此實因由我黨政軍警，對政府堅壁清野、焦土抗戰之政策，未能貫徹施行，以致資敵利用也。¹⁹

由於有此缺失，因此同年10月下旬廣州、武漢兩重鎮相繼撤離時，國府均曾嚴令實施焦土政策，武漢並責由戴笠及軍統人員破壞，但成效並不理想。關於廣州撤守，中國國民黨副總裁、國防最高會議主席汪兆銘曾有艷電致蔣中正，質疑焦土破壞的必要性，電文稱：「此次廣州放棄時，縱火焚燒，除軍事設備外，民居商店亦一律被燬，雖云不以資敵，然民怨已深，將來淪陷區內之工作，必受影響，利害相權，利少害多。告國民書中焦土一段，應否注意及此，稍加分別，謹陳管見，以備裁奪。」²⁰ 而軍事委員會參事室主任王世杰亦在11月28日的日記中，檢討廣州撤守情形：

我軍反攻廣州，近日又頓挫，一則敵軍近又增援，一則廣州原有之防禦工事本甚堅強，余漢謀、吳鐵城等于撤退時，大半均未毀壞，今則轉為敵軍利用也。在渝粵人，對余、吳極憤慨，蓋廣州民居市店，因余、吳之撤退大半被燬，軍事工作轉尚留資敵用，足見余、吳之張皇，罪不可宥。²¹

至於武漢方面，在決定撤守前夕，國府當局為執行焦土政策，曾強迫民眾離開武

¹⁹ 「賀耀組戴笠呈蔣中正由於堅壁清野焦土抗戰政策未能貫徹以致資敵利用於籠絡九江市民」（1938年10月13日），〈民國二十七年（五）〉，特交檔案—一般資料，《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285-045。

²⁰ 蕭李居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冊—民國27年7月至10月（臺北：國史館，2010年7月，初版1刷），頁497-498，民國27年10月31日條。（以下簡稱《事略稿本》）

²¹ 王世杰，《王世杰日記》手稿本（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79年3月，初版），第1冊，頁435-436。

漢疏散。其情形據徐永昌10月23日日記稱：

郭悔吾警備司令云，日來因強迫居民疏散（警察挨門宣告限二十？以前離漢，不走以漢奸論），警察自攜眷以去者或令警察押解居民出走者，今所存警察不及二分之一，所以維持地面頗成問題（疏散目的地鄂西各縣）。關於強迫疏散居民之理由，前日貴巖謂係使日方少幾個順民（貴巖忽略了此等居民為何而至漢口，彼奔生活而來，今強驅之去，是強其離開生活，不惟不仁，亦做不通。且何以不強迫租界居民離漢市？何以不強迫富有之家離漢市？）。²²

10月24日，國府決定對武漢實施焦土政策。據是日徐永昌日記記載：「武漢除法租界及一二三特區外，已無甚警察。已決定留戴雨農在此，任轟炸各建築等，余為最後之挽救，以為此於敵無損，特啟敵之破壞，將來仍須我人民出錢再修也。」²³ 然而，雖有汪兆銘、徐永昌等人質疑焦土抗戰，但並未影響國府對於焦土政策的實施。25日上午，蔣中正下令武漢實施爆破，指示守軍轉移兵力，並謂：「對敵行動切不可稍有消極緩和之意，必須堅定簡單明白，而示我和戰一定之限度，則幾矣。否則無異示弱求情，則敗亡矣。武漢之爆裂破壞，不僅使敵一無所得，失其攻漢之目的，且示其同歸於盡之決心，非此不能使敵有所感悟也。」²⁴ 10月31日，蔣中正在檢討當月軍事時，亦稱：

本月廣州武漢兩大重鎮，雖相繼失陷，然而軍事處置覺有餘裕，心神亦甚閒適，不如南京與徐州失陷時之拮据也。惟武漢撤退時，郭懌不奉命令，擅自先退，以致一切計畫不能全部完成，飛機場破壞亦不澈底，乃被敵軍即時利用，此實余思慮不周，用人不當之所致也。²⁵

據此，顯見此際蔣中正無視內部反對意見，仍堅持焦土抗戰政策。蔣認為：「倭寇民族特性急而且短，其國徽為櫻花，其人好剖腹自殺，此皆急性短命之表徵；而其軍事學術，非德式即法式，皆以短兵白刃速戰速決為性能。吾人對倭作戰，

²²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4冊，頁407-408。郭懌字悔吾，時任武漢警備司令；賀耀組字貴巖，時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一處主任。

²³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4冊，頁408。

²⁴ 蕭李居編註，《事略稿本》，第42冊，頁467-469，民國27年10月25日條。

²⁵ 蕭李居編註，《事略稿本》，第42冊，頁500-501，民國27年10月31日條。

既知其性能與習尚，即應以堅韌延緩持久不決之道，制其死命也。」²⁶ 焦土抗戰正是中國實施持久消耗戰的利器，而國府當局對於焦土政策的堅持與實行，則是引發長沙大火事件的重要背景。

叁、事件爆發

自1938年10月25日武漢撤守後，湖南成為日軍下一個進攻目標，戰地氣氛日益緊張。湖南省府雖西遷沅陵，但張治中則以省主席兼保安司令、抗日自衛團總團長名義，調派部分人員組成軍事性質的行署，準備隨戰局形勢機動轉移，就近指導戰區政務，並準備策動開展游擊戰。²⁷ 及至11月10日前後，日軍逼近汨羅江，長沙情勢緊張。據張治中日後回憶稱，其於11月12日上午9時接到侍從室第一處副主任林蔚來電，傳諭長沙要用焦土政策；旋接蔣中正「文侍參電」，電文曰：

限一小時到。長沙張主席：密。長沙如失陷，務將全城焚毀。望事前妥密準備，勿誤！中正文侍參。²⁸

張治中乃召集長沙警備司令鄧悌、省保安處長徐權會商，並指定警備司令部負責籌備，保安處協助進行。據鄧悌遺著《焚餘日記》記載，11月12日當天適值孫中山誕辰，長沙準備舉行火炬遊行，因時局緊張，居民逃散，到會僅1,500人，張治中與鄧悌正忙著商談破壞長沙一事，故均未參加。張治中惟恐辦得不澈底，一再慎選指揮人員及執行者，他不同意鄧悌提出的名單，最後親自決定派警備第二團團長徐崑為總指揮，將所屬士兵3人編為一組，派出100組到各地放火。隨後張治中又召其心腹省保安處長徐權，面示一切。警備團長徐崑奉到準備命令後，即通令部屬如聞警報聲響，或看到一處起火，就可放火。恰巧當天深夜南門外傷兵醫院不慎失火，警備二團士兵一見火起就四處放火，用洋油和木柴點了火就向屋

²⁶ 蕭李居編註，《事略稿本》，第42冊，頁550-551，民國27年11月8日條。

²⁷ 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臺北：谷風出版社翻印，無出版日期），頁262。

²⁸ 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頁263。

頂或房內拋擲，遂造成焚城慘劇。²⁹ 這場大火13日整整燒了一天，14日以後火勢始漸小，直到16日猶有未熄之餘燼。據事件發生後陳誠所稱，總計長沙全市房屋被焚者，幾乎占99%，堪稱全城皆焚。³⁰ 而民眾由於在睡夢中驚醒，大火四起，逃路無門，罹難者竟多達萬餘人。³¹ 生者如何安置，死者如何入殮，俱成嚴重問題。

關於大火責任問題，11月13日午間，陳誠與張治中晤面詢及長沙大火時，張治中猶聲稱其完全不知情，並認為「定係另一系統所為」。³² 所謂「另一系統」，係指戴笠軍統局，前文徵引軍情局出版的〈戴雨農先生傳〉中，即指稱張治中誣陷戴笠指使縱火。³³ 事實上，當長沙焚城時，蔣中正適在廣東韶關視察，在情況不明下，侍從室方面已有人傳說此次長沙放火係戴笠軍統局所主持。³⁴ 而11月14日徐永昌在其日記中亦稱：「或謂此事戴雨農亦參加，似已取得蔣先生同意者。按前次漢口之破壞即由戴執行之，余於（十月）二十四日傍晚尚切囑其再以余意詢蔣先生，果必行時再執行，當時戴似亦重余說者，不悉何以又有此舉，是真不與人民留應留之生活耶？余確認此等舉動與敵無甚損，與我有大害也。」³⁵ 正因戴笠先前負責武漢撤守時的破壞行動，此際軍統局局本部又遷長沙，戴笠亦在此坐鎮，更加深外界傳聞之可信度。對此，事後（11月17日）戴笠有長篇報告電呈蔣中正以自清。

先是，自武漢撤守後，軍統局局本部就臨時遷到湖南長沙，進駐小午門外東莊米家花園（又稱長沙第一公園），戴笠亦留駐長沙指揮督導一切。及至11月10日左右日軍逼近汨羅江，長沙情勢緊張，軍統局乃加緊撤退人員，一批撤到湘西

²⁹ 轉引自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冊，頁465-466。

³⁰ 陳誠，〈長沙大火雖已分別處分惟艱悌之死實替人受過〉（民國27年11月20日），陳誠著，何智霖、高明芳、周美華編輯，《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下冊（臺北：國史館，民國95年7月，初版1刷），頁483。

³¹ 陳誠口述，趙虛吾整理，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114。

³² 陳誠口述，趙虛吾整理，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118。

³³ 費雲文編纂，〈戴雨農先生傳〉，國防部情報局編，《戴雨農先生全集》，上冊，頁94。

³⁴ 〈戴笠電黎鐵漢侍從室傳長沙放火係軍統局主持完全不確謹將所知奉告〉（民國27年11月17日擬），收入吳淑鳳等編輯，《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彙編：軍情戰報》（臺北：國史館，2011年7月，1版1刷），頁192。

³⁵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4冊，頁421。

沅陵轉赴重慶，另一批則撤到衡陽再轉重慶；撤退人員按點名次序上車，老弱病者坐小車，其他一律坐大車。³⁶ 據戴笠報告稱，11日下午蔣中正離開長沙，戴笠於火車站送行時遇見鄧悌，曾詢及萬一我軍放棄長沙時，對長沙破壞工作有無準備？據鄧悌回答此事已有計畫，並已準備一切。戴笠再詢其整個計畫如何？由誰負責？鄧悌則答以由保安處與警備司令部負責。隨後鄧悌詢問戴笠能否派人參加長沙破壞行動？戴笠則回答請以具體計畫見示，自當竭力協助。當晚，戴笠即囑軍統局長沙工作負責人李人士，向保安處與警備司令部探查長沙破壞計畫。據李人士報告，保安處與警備司令部對破壞工作尚無具體辦法。³⁷

11月12日下午，因聞守軍放棄岳州，退守汨羅江之消息，當時留在長沙的軍統人員尚有約200名幹部、眷屬無車可運，最後戴笠決定這批人員一律步行，經廣西、貴州到重慶，並派祕書曾堅、交通科長胡子萍領隊，搭當天最後一班火車到衡陽。³⁸ 隨後，戴笠親至長沙各街道視察，見秩序混亂，警察亦不多見。戴笠因湖南省會警察局長文重孚係由其負責向張治中保薦，眼見當時長沙情形混亂，警察不能出面維持，文重孚固然不能辭其咎，但戴笠亦須負責，故立即以電話責斥文重孚，並促其速至戴笠處面談。旋文重孚來晤，據稱渠已奉警備司令鄧悌命令，將警察集結各分局待命，鄧悌並云待見到城內外起火，警察即可撤退郊外等情。戴笠當囑文重孚須慎重鎮定，並須多派警察維持秩序，萬不可如此慌亂。隨後，戴笠即電詢鄧悌，據鄧悌稱敵軍已迫近汨羅江，戴笠則答以恐無如此迅速。復詢其對長沙破壞工作究竟如何計劃？鄧悌答云已準備炸藥、煤油待用，並要戴笠派員參加。戴笠則仍請其以具體計畫見示，並告以軍統局所有爆破人員及材料均移至衡陽，當約定是日晚上10時戴笠親往警備司令部與鄧悌面商一切。³⁹

及至12日晚上9時餘，戴笠突接文重孚電話，轉告鄧悌當晚10時須有事外

³⁶ 陳正，〈長沙大火前後的親歷和見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抗日戰爭》，下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8月，北京第1版），頁4-5。

³⁷ 〈戴笠電黎鐵漢侍從室傳長沙放火係軍統局主持完全不確謹將所知奉告〉（民國27年11月17日擬），收入吳淑鳳等編輯，《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彙編：軍情戰報》，頁193-195。

³⁸ 陳正，〈長沙大火前後的親歷和見聞〉，頁5。

³⁹ 〈戴笠電黎鐵漢侍從室傳長沙放火係軍統局主持完全不確謹將所知奉告〉（民國27年11月17日擬），收入吳淑鳳等編輯，《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彙編：軍情戰報》，頁195-199。

出，囑戴屆時不必往晤。文重孚並告訴戴笠，按照當時情形看來，鄧悌或即須離開長沙等情。戴笠當以電話聯繫鄧悌，試圖探詢究竟。詎電話久搖不通時，適接派往火車站交涉載運軍統人員赴衡陽之胡子萍報告，稱彼所坐汽車被警備司令部警戒兵扣留在新軍路。戴笠當即電詢文重孚，據稱聽說警備司令部扣留車輛係為運送爆破人員與材料之用。當夜12時，忽見城內外火起，軍統局本部附近之航空委員會停車廠與汽車兵團車廠亦相繼起火。戴笠因軍統赴浙、赴衡人員尚在東車站候車，當乘車赴東車站視察時，途間警戒兵即亂放槍阻止前進，戴笠仍繼續前進，卒達車站。回局後，乃將當時長沙起火與混亂情形摘要電詔關報陳蔣中正，這就是戴笠所親歷長沙大火的經過。⁴⁰ 在報告的最後，戴笠稱其於13日上午8時半離開長沙，9時在猴子石碼頭曾見張治中隨從副官至碼頭找保安處長徐權；下午5時，戴笠改由湘潭渡江，於湘潭以西復見裝載警備司令部特務隊員與鄧悌行李之卡車，中途被召回，「此足證湘省軍警當局當時之倉皇情形也」。⁴¹

長沙大火事件發生後，各界反應頗為激烈，如王世杰即曾在11月13日日記中稱：「長沙今日大火，我軍已顯然準備放棄長沙。」⁴² 次日，王世杰更謂：

長沙大火，顯係我軍事機關預定行動。燃燒範圍之廣，中外駭然；即長沙對岸之湖南大學等校舍，亦被燒燬，尤為可駭。湘人之在渝者聞甚憤慨，至以「不抗戰而焦土」責備守軍。守軍撤退，或為軍略上之必要，肆意騰燒，甚至並學校文化機關亦在其列，似無可恕。⁴³

不僅如此，政府要人亦對此甚表不滿。11月16日王世杰在日記中記載：「今日國防最高會議開常會，汪（兆銘）、孔（祥熙）、于（右任）等對於長沙之破壞，均大不滿。」⁴⁴ 18日，國民參政會駐會委員會在重慶開例會，據王世杰稱：「到會者對於長沙火劫，群表憤慨，並決定聯名致電蔣先生請其查辦主動之

⁴⁰ 〈戴笠電黎鐵漢侍從室傳長沙放火係軍統局主持完全不確謹將所知奉告〉（民國27年11月17日擬），收入吳淑鳳等編輯，《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彙編：軍情戰報》，頁199-202。

⁴¹ 〈戴笠電黎鐵漢侍從室傳長沙放火係軍統局主持完全不確謹將所知奉告〉（民國27年11月17日擬），收入吳淑鳳等編輯，《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彙編：軍情戰報》，頁202-203。

⁴² 王世杰，《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1冊，頁424。

⁴³ 王世杰，《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1冊，頁424-425。

⁴⁴ 王世杰，《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1冊，頁426。

人。」⁴⁵ 是以，如何儘速處理善後，平復人心，顯然成為國府的當務之急。

肆、事件善後

當1938年11月13日長沙終日大火、焚燬無算時，蔣中正正在廣東韶關接獲情報之際猶不置信。蔣在當日記事中說道：「本日長沙電話終日不通，據報傷兵放火，秩序甚亂，以意度之，或不至此。或因修電線無人，以致延緩通話也。」⁴⁶ 但到了11月14日消息確認，「昨日午前三時，長沙地方軍警當局，誤信謠言，以為敵寇將至，縱火焚燒市區建築，釀成慘禍。」蔣中正聞之頗感心痛，並稱：「長沙大火，焚燬甚慘，聞之心痛，地方人員之不力，殊堪浩歎。如武漢撤退，非由我親自主持至最後一日，出此意外，則更貽笑中外。」因此，決定拿辦警備司令酆悌，追究長沙放火案。⁴⁷ 由於事件引發的風波甚大，蔣中正決定親赴長沙處理。16日下午5時，蔣由南嶽起程，晚上8時到長沙，極目所見，「黑暗淒慘，莫可言喻」。待蔣與陳誠、張治中相見時，「黯然不知所言，乃強言研究，責成文白（張治中）根究肇禍之人，速定處分」。⁴⁸ 蔣中正對於張治中臨事倉皇、推卸責任甚為不滿，在當日記事稱：

長沙焚燬，不僅影響於前方軍事，而且影響於將來政治更大。張治中身為省主席，不知責任所在，猶以為普通罪過，尚思推諉卸責，此其表示無能無知之事小，而對於革命與廉恥之事大！余自恨平時不能信賞必罰，痛絕愚懦，以致遭此不測之災，尤宜自咎也。⁴⁹

11月17日上午，蔣中正開始巡視災區，登天心閣瞭望，城區已為一片焦土，途中時見傷病無告之官兵，更為悲惶；乃與各幹部會商善後辦法，決定將肇禍的警備第二團立即調離長沙至汨羅江前方，並設法恢復長沙秩序。此日視察對蔣中

⁴⁵ 王世杰，《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1冊，頁428。

⁴⁶ 蕭李居編註，《事略稿本》，第42冊，頁562，民國27年11月13日條。

⁴⁷ 蕭李居編註，《事略稿本》，第42冊，頁563，民國27年11月14日條。

⁴⁸ 蕭李居編註，《事略稿本》，第42冊，頁569，民國27年11月16日條。

⁴⁹ 黃自進、潘光哲編輯，《蔣中正總統五記：省克記》（臺北：國史館，2011年12月，初版1刷），卷13，頁14，民國27年11月16日條。

正刺激頗深，在記事時蔣悲憤說道：「長沙焚燬，精神上之打擊，十百倍於戰敗之痛苦，可恥可悲，莫甚於此也。」⁵⁰ 經實地調查及接獲各方報告，蔣中正對於事件起因及責任問題已大致瞭解，但如何處理善後卻頗感棘手，尤其在責任追究問題上最難措置。誠如陳誠在致其妻譚祥家書中所言，蔣中正雖煞費苦心來處置長沙大火善後，但其實也想不出更好的辦法，其原因在於：「第一須顧慮不為敵暴露我政府之弱點；第二不能使湘民反感，增加政府困難；第三不可使文白政治生命從此斷送，而予以善後機會。」⁵¹ 張治中本應負起長沙大火最大責任，但在保全張治中，「不可使文白政治生命從此斷送」的考量下，蔣中正只有棄車保帥，因此大火責任追究僅至鄧悌等人止。18日，軍事委員會為長沙縱火案組織軍法會審，長沙警備司令鄧悌、警備第二團團長徐崑、湖南省會警察局長文重孚三人被提起公訴。19日，軍法會審訊結，鄧悌等三人被判處死刑，為長沙焚城負最重之責任。蔣中正雖稱「三人皆為黃埔學生，悲痛無似，只有安置其家屬，聊以慰私而已」，⁵² 但仍發交株長警備司令部於次日執行。

11月20日，蔣中正致電行政院長孔祥熙，詳述長沙大火肇禍原因及處理經過，並請轉呈國府主席林森，官方算是已對此事件定調。電文曰：

查我軍對於重要城市與軍事有關建築物，施行破壞，免資敵用，原為作戰上之必要。長沙既臨戰區，事前準備亦為當然之事。乃地方軍警當局，於我軍放棄岳州時，即信謠言，驚慌躁切，將準備工作變為行動；同時一部民眾，鑒於敵機轟炸平江、岳州、通城等縣之慘酷，激於民族義憤，以為敵寇將至，不如先行自焚其室，遂至一處起火，到處發動，波及民居，不可收拾。災情之重，損失之鉅，中正親臨視察，實深愴痛。而中正到長沙後，即一面遴員派隊分別收容，救濟難民，恢復秩序及交通通信；一面澈查肇事禍首，交由軍法會審。查長沙警備司令鄧悌、警備第二團團長徐崑，誤信謠言，驚慌躁切，辱職殃民，罪無可逭；省會警察局長文重孚，未奉命令，放棄職守，均經本會高等軍法會審判處死刑，業經發交株長警備司令部，依法執行在案。又湖南省政府

⁵⁰ 蕭李居編註，《事略稿本》，第42冊，頁569-570，民國27年11月16日條。

⁵¹ 陳誠，〈此次長沙大火不知委座何以不令軍隊執行而令地方政府準備〉（民國27年11月21日），陳誠著，何智霖、高明芳、周美華編輯，《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下冊，頁484。

⁵² 蕭李居編輯，《事略稿本》，第42冊，頁579，民國27年11月19日條。

主席張治中，用人失察，防範疏忽，請予革職留任，責成善後，以觀後效。保安處長徐權，驚惶失措，搖動人心，業令革職查辦；其餘有關人員，亦正澈查究辦中。所有罹難軍民，流亡民眾，及所受損失，經飭湖南省府督同當地軍警機關，迅予設法收容救濟，調查具報，並飭於被災區域逐步清理，分期興復，以期少慰人心，而挽元氣。⁵³

國府當局的嚴厲處置，對當時人心確有相當的撫慰。王世杰在聽聞鄧悌等人伏法後，即在11月21日日記中寫道：「長沙大火事件，各方均憤慨，湘人尤甚。聞蔣先生曾于十六日親往長沙視察，亦甚痛憤。業將負責之軍警長官鄧悌、徐崑、文重孚（均係黃埔軍官學生）處以死刑，人心大慰。張治中主席亦將由行政院予以『革職留任』處分。」⁵⁴ 然而，對於鄧悌等人被處死刑，知情者頗有不平。如侍從室幕僚唐縱在日記中即稱：「我離衡山時，聞長沙大火，不信。及抵桂林，此事證實，但不解此中原因。何以敵人方陷岳州，長沙即縱火燒毀？今在公路局，得悉力餘（鄧悌）與省會警察局長文重孚、保安第二團團長徐崑〔崑〕三人執行死刑，聞之不勝悲傷！力餘以警備司令而送掉性命，可不浩嘆！」⁵⁵ 又謂：「現在已經證實鄧力餘確被槍決，不勝惋惜！力餘不是做警備司令的人才固矣，而張主席（張治中）不負責，害了力餘，也有關係。」⁵⁶ 即連張治中後來在回憶錄中亦自承：「鄧悌原是不應死的！應死的或者是省會警備司令這一個職務，就是死於『直接責任』這四個字。」⁵⁷ 其實，徐崑、文重孚二人之死又何其不然？

在善後方面，首要工作就是清理火場。為此，蔣中正乃於11月19日手諭張治中，從速清除長沙街道火場：

本日下午視察市內情形，其應速辦之事如下：（一）沿江岸美國房屋鄰近之餘焰尚未滅熄，應即撲滅；（二）各馬路之焦柱磚瓦，仍堆積路傍，應先撤除至階上，最好搬運至被燒之屋內；（三）警察崗位夜間應即點燈；（四）長沙原有之消防器具應即運回，設法恢復消防隊，嚴防

⁵³ 蕭李居編註，《事略稿本》，第42冊，頁581-583，民國27年11月20日條。

⁵⁴ 王世杰，《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1冊，頁430。

⁵⁵ 唐縱，《唐縱失落在大陸的日記》（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87年3月），民國27年11月21日條，頁65。

⁵⁶ 唐縱，《唐縱失落在大陸的日記》，頁65，民國27年11月27日條。

⁵⁷ 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頁271。

以後之火災，此最重要，並將鄰近各縣之消防隊，先令其分派一部來長沙服務；（五）應速召集鄰近各縣夫役，至少要五千名，專為清除各街道之火場，與整理及搬運焚燬之磚木及瓶缸用具之類，必須擬定具體清除計畫，分區分道限期限時，尤須指定領導得力負責之人員，按期清除。限本月底完成第一步全城清除之工作，然後第二步再將焚燬之各房屋殘壁破屋拆除，將其磚木堆積一指定地點，使其空地可以規劃建築，總之必須減少人民觸目傷心之感，是為至要。每街每街必須指定一二地點堆積磚木之用，並擇其可用之磚木檢拾一處，以備補築之用，此為第三步之工作也。⁵⁸

同時並電復戴笠：「速回長沙協助善後為要」。⁵⁹ 20日上午，蔣中正巡視長沙市區後，除與陳誠、張治中等談話，指示善後辦法外，另手諭張治中，督促軍警民伙限期清除火場：

上午視察市內一般情形，比昨日進步。現在最要者，如何使長沙軍隊官兵與警察，能熱情清除其所管區內之火場，尤其是各管區以內站崗之警察，必須令其將附近所見到之處，自行動手清除，當然每一站崗警察或每一崗位，皆應有清掃之工具，使之能負責自動清除。其次為督促各縣招來之民伙，使之能竭力工作，加倍努力，此可做包工制辦法，指定每十人或二十人派一工頭，限其幾日清除，在指定區域與限期之內，如其能快能實，則加獎其工資，總要愈快愈好。必須限三星期內將中昨日所定之第三步工作完成，可使民眾對政府怨忿之心減少，此實為最要者也。茲發獎賞清掃工作之軍警與民伙洋二萬元，先發給其半數，其餘半數俟工作完成後，獎賞其最努力、最快、最整潔之兵工，以資鼓勵也。⁶⁰

20日下午3時，蔣中正離長沙返南嶽，出發時見市街人民漸眾，於心略慰。蔣稱：「上星期處理廣州失守重案之後，不料又有長沙失火重案之處理，此皆我用人不當之咎，而亦中國人才缺乏之故。南北奔走，難關重重，何日得已。身心自覺痛苦，而精神煥發，信念與希望於此益堅。只要處處所發生不測之困難，皆能為我

⁵⁸ 蕭李居編註，《事略稿本》，第42冊，頁577-579，民國27年11月17日條。

⁵⁹ 蕭李居編註，《事略稿本》，第42冊，頁577，民國27年11月17日條。

⁶⁰ 蕭李居編註，《事略稿本》，第42冊，頁585-587，民國27年11月20日條。

所克服，則勝利更近矣。」⁶¹ 然而，善後復員千頭萬緒，情況並不如蔣中正所言樂觀。

在恢復長沙秩序方面，由於員警星散，蔣中正有意抽調憲兵一團以上兵力馳援長沙。但據11月19日戴笠電文稱：「憲兵副司令張鎮同志刻已過沅江赴長沙，生頃與谷司令（按：憲兵司令谷正倫）通電話，悉駐常德之一營憲兵已于昨夜用西南運輸處汽車急運長沙矣。惟據張鎮同志面告，鈞座囑抽調一團以上之兵力赴長沙殊難辦到，因其憲兵均有指定任務，不易調集也。生已告以速將前駐長沙歸警備司令部指揮之一營迅即查明行蹤，星夜追回長沙矣。」⁶² 待20日戴笠返長沙後，即奉蔣中正命令投身善後處理中。21日，戴笠致電蔣中正，呈報其對長沙善後的意見：

特急，南嶽委員長蔣鈞鑒：密。

1. 查昨晚湘省府臨時會議通過有發行三千萬建設公債，為建設長沙之用。在目前之時勢下，實尚談不到用此鉅款來建設長沙，而況湖南人民□受此次長沙火災之巨大損失，今湘省當局復要發行三千萬公債來增加人民負擔，此事一經公佈，必引起湖南人民甚大之反對無疑，政治上影響頗大。張主席如以此來呈請□，請祈鈞注。
2. 長沙市掃除障礙、整理火場等工作尚未開始，因各縣民夫未來，工作器具亦無有也。張主席辦事殊缺快幹實幹之精神，而其計畫復多不切實際也。生非敢評論長官，實目睹種種情形，不得不據實上聞也。

生笠叩。⁶³

11月23日，戴笠更有一長電呈蔣中正，報告其對長沙善後及湘省局勢的觀察，電文曰：

急，南嶽委員長蔣鈞鑒：密。

1. 生奉諭協助張主席辦理地方善後，曾向張主席擇要貢獻。省府已有善

⁶¹ 蕭李居編註，《事略稿本》，第42冊，頁587，民國27年11月20日條。

⁶² 《戴笠先生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44-010104-0004-078，頁1-4。

⁶³ 〈戴笠電蔣中正長沙火災損害鉅大張治中辦事不力〉（民國27年11月21日擬），收入吳淑鳳等編輯，《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彙編：軍情戰報》，頁204-207。

後委員會之組織，生未蒙張主席約往參加，自當從旁竭誠協助也。惟生處日前倉卒撤離長沙，現有大部份人員在衡陽辦公，生急須親往妥為部署，故定本日下午赴衡陽一行，再回長沙。

2. 長沙市民連日回來者頗多，但因見故居已燬，多仍回附近鄉間暫住，有少數者已從事整理自己之火場，小菜已有購買，惟日用必需品尚缺乏□□。
3. 目前最要之辦法應先清除橫在街道之電桿電線與推倒斷垣殘壁，一則掃除交通之障礙，一則免除行人之危險也。但因各縣民伕未到，迄未動工，現省會警察局員警回長沙者已有九百餘人，除已恢復□□巡邏警外，生已嚴囑督察長宋梁速集合所有員警蒐集工具，盡力實施上項之工作矣。
4. 目前除向附近各縣徵雇民伕、購買工作器具整理火場外，尚應向各縣徵雇土木工人並購集木料、毛竹、蘆蓆、稻草等，為搭蓋臨時商場與房舍之用，並向各縣雇集民船、手車為運輸之用。查善後會議對此急切需要而較易舉辦之事尚無詳盡計及，生于見張主席時，即承告將籌發三千萬建設公債，並恢復電燈、電話等，迨生將前項意見奉陳，承答已令各縣辦理矣。實則當長沙火發時，寧鄉、湘潭各縣縣長當時均有逃避之情報，各縣縣長能否于最短期間徵集五千名民伕與工作器具等，尚成一問題也。故目前省府應詳查各縣長到任後之政績以決定去留，而于目前交辦各事並須飭令各區行政督察專員，並臨時加派各廳科長以上之人員分往各縣嚴加督飭，限期辦到也。否則徒恃一紙命令，絕非今日湖南政治所能切實辦到也。

生笠叩。⁶⁴

從戴笠上述報告中，均可看出其對張治中善後能力的質疑，甚至直言張氏「辦事殊缺快幹實幹之精神，而其計畫復多不切實際」。陳誠亦在其家書中批評道：「文白兄為人最愛好、最要面子，此次主湘確抱無限希望。惟可惜相助者不得其人，一切均重表面，而不切實際耳。」⁶⁵「我自問對於文白幫忙不少，但文白太

⁶⁴ 〈戴笠電蔣中正已嚴囑屬下傾力救災另各縣縣長對救災事有逃避之情〉（民國27年11月23日擬），收入吳淑鳳等編輯，《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彙編：軍情戰報》，頁208-214。

⁶⁵ 陳誠，〈長沙大火雖已分別處分惟鄧悌之死實替人受過〉（民國27年11月20日），收入陳誠著，何智霖、高明芳、周美華編輯，《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下冊，頁483。

無人了。所以他自己雖想做好，結果僅及表面而毫不切實際。如對於地方秩序及民眾組織，尚趕不上湖北。尤其在抗戰軍事上，而湖南除出兵外，其他毫無成績可言。」⁶⁶ 在上述電文中，戴笠、陳誠都提及張治中「不切實際」，足見張氏不論治湘或處理大火善後均缺乏能力。在此情形下，張治中的去職只是時間早晚而已了。1939年2月，國府正式發表薛岳接掌湖南省政府主席，張治中解職赴渝，長沙大火善後事宜至此暫告一段落。

伍、結語

1938年長沙大火事件，實緣起於中國政府為打破日軍「以戰養戰」策略，所實施的「焦土抗戰」政策。焦土政策可說是「堅壁清野」的一種方式，而所謂堅壁清野，不論中外戰史均曾有過，本不足為奇。誠如後來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與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所發表長沙大火說明文告中稱：「蓋戰略轉移，我軍對於預定撤退的戰略支點及重要城市之建築物，施以破壞，免資敵用，原為作戰上之必要，在各國戰史上亦不乏先例。故長沙既臨戰區，政府於事前有所準備，當為必然之事實。」⁶⁷ 但就如同陳誠所言，問題的關鍵是在應當如何實施，「如僅僅為了堅壁清野之名而放火燒城，並不計較有無成效，致使萬萬千千無辜的人民做毫無代價的犧牲，這就談不到什麼計畫或政策了，而是一種無可原恕的殘暴。」
「再則在實施焦土之前，至少應先期有一次預告，不怕時間短暫到一天或半天，總要給人一點逃避的機會。而長沙這次放的火，不但不曾預告，而且在深夜中為之，全城四面突然一齊火起，居民在睡夢中聞警，多半隻身逃出性命，倉皇中葬身火窟者達萬餘人。而逃出來的人於家破人亡之餘，亦多痛不欲生，此情此景，尤使人不忍卒睹。」⁶⁸ 因此，陳誠稱此事件「影響所及，足使軍心動搖、民眾失

⁶⁶ 陳誠，〈此次長沙大火不知委座合已不令軍隊執行而令地方政府準備〉（民國27年11月21日），收入陳誠著，何智霖、高明芳、周美華編輯，《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下冊，頁484。

⁶⁷ 轉引自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頁268。

⁶⁸ 陳誠口述、趙虛吾整理，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113-114。

望，顯可成為抗戰之危機」，⁶⁹實不為無因。譬如一個月後汪兆銘由重慶出走河內，尋求與日方和議，即與此有關。

汪兆銘平素對於抗戰即乏信心，尤其擔憂中日長期戰爭帶給中國國力、民力的戕傷。1938年1月12日，汪兆銘曾以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身分，在《中央日報》發表〈如何使用民力〉一文，對當時相當流行的「焦土抗戰」口號有所闡釋。汪氏稱：

所謂焦土戰者，是因戰而至於焦土，絕不是不戰，更絕不是即使不戰也要焦土。由前之說是焦土戰，由後之說是不戰而焦土；二語絕不相同，不可混為一談。焦土戰必能發生效力與影響；不戰而焦土，則不惟不能發生同樣的效力與影響，而且適得其反。⁷⁰

顯見汪兆銘先前即已反對「不戰而焦土」。1938年10月廣州撤守時所實施的焦土破壞，益使汪憂心民怨沸騰，人心不固。如今長沙大火慘劇復使其振振有辭，再三拿此事為口實，認為中國不能再抗戰，應求和平。⁷¹由此，更堅定了汪兆銘出走議和的決心。

長沙大火事件傷亡慘重，損失無算，張治中身為湘省主席，本應負起最大之責任。事後蔣中正雖親赴長沙視察災情，煞費苦心處理善後，但因須維護張治中「政治生命」，以致各方對善後處置均極不平。行政院長孔祥熙以張治中信用已失，於11月24日電蔣中正時表示：「長沙大火，至深痛惜，承示處理經過，業已轉呈主席並提院議照辦。受災人民，亦已設法實施救濟安撫。連日湘人會議，仍甚忿慨，本日湘籍參政諸人來謁，表示文白信用已失，繼續任職，難孚民望，應請遴選妥員接替，以慰民心云云。湘省正當軍事緊張之際，關係重大，究竟如何

⁶⁹ 「電呈委員長蔣以長沙大火請予處分」（1938年11月17日），《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108-00022-237。另見陳誠著，何智霖、高明芳、周美華編輯，《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上冊（臺北：國史館，民國95年7月，初版1刷），頁336。

⁷⁰ 汪兆銘，〈如何使用民力〉，《中央日報》，民國27年1月12日，版2。

⁷¹ 「汪兆銘電谷正綱對長沙放火事件覆謂無此權力惟對國事不能不言曲解謾罵只有聽之」（1938年11月14日），〈文件·函電與函件·民國27年汪兆銘與本黨有關之各項函電（2）〉，《汪兆銘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18-010100-0006-017。另見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冊，頁466。

答復，即祈裁示。」⁷² 此電當牽動張治中最後的去職。但更重要的是，經長沙大火事件後，各方對焦土抗戰政策開始深切檢討。如11月22日孔祥熙在致電蔣中正時，即力主限制破壞範圍，妥慎從事。電文稱：

文（12）日岳陽始陷，元（13）晨長沙即自焚燬，此間人士頗多怨望，尤以湘籍諸人為最。竊意破壞辦法，似應限於有關軍事之設備，而足以資敵者。今敵在三百里以外，即將名城燬為焦土，地方負責人員，殊為魯莽。因此發生誤會，後方城鎮，已表示惴惴不安。流弊所及，於國民敵愾同仇之心，大有影響。似應有以平人民之憤慨，免影響抗戰前途。擬請嚴飭各戰區軍事負責人員，嗣後應妥慎從事，以維民心，而安大局。敬陳所見，尚祈鑒察。⁷³

事實上，即連戴笠對於焦土政策亦持保留態度，是以日後軍統人員執行撤退時的破壞行動，大體均以軍事目標為原則。由於焦土政策的傷害太大，甚至到了1949年11月的國共內戰末期，一位任職外交部的官員李列一，在其家書中仍不無疑慮地寫道：「（前略）謠言四起，南川已受直接威脅，重慶的人民，害怕共匪又害怕國軍臨走時實行『焦土』政策。貴陽失陷時，據各商家傳言就大火三天。因此，凡留在重慶不走的人都希望能有什麼辦法，可渡〔度〕過那一段過渡時期。」⁷⁴ 據此，足見抗戰初期長沙焚城、焦土政策所留下的記憶陰影，對民眾的心理影響有多大了。

72 「孔祥熙等電蔣中正長沙大火湘人極為憤慨湖南參議會表示張治中信用已失請速派員接替以慰民心請對此給予指示」（1938年11月24日），〈領袖指示補編（十三）〉，特交文電—領袖事功—領袖指示，《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90106-00013-080。

73 「孔祥熙等電蔣中正長沙大火後方人士頗多怨望擬請嚴飭各戰區軍事負責人員嗣後妥慎從事以維民心俾免影響抗戰前途等文電日報表」（1938年11月22日），〈特交檔案·一般資料〉，《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504-107。

74 「李列一致伍家賓函」（1949年11月26日），李列一原任職外交部科長，1949年外交部遷臺時，李氏因妻女留湖南，遂選擇遣散回渝。此函係李氏致其岳父伍家賓，伍氏為立法委員，1949年隨政府來臺。本件資料承羅久蓉教授提供，謹致謝忱。

徵引書目

一、檔案、史料彙編

《陳誠副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008-010108-00022-237，「電呈委員長蔣以長沙大火請予處分」。

《閻錫山史料》（臺北，國史館藏）

116-010108-0245-050，〈文件·電報·各方往來電文原案及錄存·各方民國22年5月往來電文錄存〉（三）。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民國二十七年（五）〉，特交檔案——一般資料。

〈呈表彙集（七十七）〉，特交檔案——一般資料。

〈呈表彙集（五十一）〉，特交檔案——一般資料。

〈領袖指示補編（十三）〉，特交文電——領袖事功。

《汪兆銘史料》（臺北，國史館藏）

118-010100-0006-017，〈文件·函電與函件·民國27年汪兆銘與本黨有關之各項函電（2）〉。

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冊—民國27年7月至10月。臺北：國史館，2010年7月，初版1刷。

吳淑鳳等編，《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彙編：軍情戰報》。臺北：國史館，2011年7月，初版1刷。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抗日戰爭》，下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8月，初版1刷。

二、文集、回憶錄、訪談錄

王世杰，《王世杰日記（手稿本）》。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79年3月，初版。

唐縱，《唐縱失落在大陸的日記》。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87年3月。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0年12月，初

版。

國防部情報局編印，《戴雨農先生全集》，上冊。臺北：國防部情報局，民國68年，初版。

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臺北：谷風出版社翻印，無出版日期。

陳誠口述、趙虛吾整理，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

臺北：國史館，民國93年12月，初版1刷。

陳誠著，何智霖、高明芳、周美華編輯，《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下冊。臺北：國史館，民國95年7月，初版1刷。

曾業英編，《蔡松坡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初版。

三、期刊、報紙

《中央日報》，南京，民國27年。

四、專書

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冊。臺北：綜合月刊社，民國62年5月，初版1刷。

李宗仁，《焦土抗戰的理論與實踐-李宗仁言論集》。出版地不詳：全面戰周刊社編印，民國27年4月，初版1刷。

薛光前編，《八年對日抗戰中之國民政府（1937年至1945年）》。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67年9月，初版1刷。

五、期刊論文

朱沛蓮，〈長沙大火別記〉，《中外雜誌》，第18卷第1期（民國64年7月）。

何智霖，〈長沙大火相關史料試析〉，《國史館館刊》，復刊第5期（民國77年12月）。

張振國，〈長沙大火真相〉，《中外雜誌》，第18卷第6期（民國64年12月）。